

中国
现代

四大才女 散文精品

张爱玲
萧红

石评梅
庐隐

高修俊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中国
现代

四大才女 散文精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精品

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精品 高修俊 编
本书精选了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精品，包括冰心、丁玲、萧红、萧军等人的作品。本书旨在展示中国现代散文的多样性和艺术成就，为读者提供一部高质量的散文选集。

冰心散文精品
丁玲散文精品
萧红散文精品

“冰心”散文精品：冰心散文精品，包括《寄小读者》、《繁星》、《春水》等作品。冰心散文以其细腻的情感、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哲理著称，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05.1.0001

责任编辑:王力行 崔跃萍

封面设计:云 青

中国现代四大才女散文精品

高修俊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信阳豫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 36 印张 72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71-3258-5/1·1279 定价:39.8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个文集收辑了萧红、庐隐、石评梅、张爱玲四位才女的散文精品 200 多篇,这些作品大都写于 30 年代,代表了“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我们之所以把她们的作品介绍给今天的年青人和广大读者,是因为她们的作品就像一坛陈年佳酿,酒味是那么浓郁爽口,回味悠长,使今人读后可以感悟过去,感悟现在,感悟未来。

在审读这部文集时,编选者声明一定要保留 30 年代的样子,所谓“原汁原味”,即使是当时的字词“的、地、得、底”,仍保留了原文中的使用法,再没有用现在的使用方法去规范,此为声明之一。另外,还有些其他词语,亦保留了原文中的用法。如“中国智识阶级”中的“智”同“知”,“不像男职员工作那末单纯”中的“末”同“么”,等等,不一一举例,此为声明之二。请读者阅读本书时仔细辨别,特别是青少年阅读此文时,一定注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汉文编辑部

1999. 1. 26

觉悟的缪斯

(代序)

历史进入 20 世纪末,无独有偶,却和这个世纪的开首,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有些看似遥远、荒置、被时代所遮掩扭变过的,却在人们不意之间必然再次重现,闪烁出璀璨的光华。就文学而言,“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以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而独树一帜。在当时的男性作家中令人耳目一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庐隐、石评梅、萧红、张爱玲可谓那个时代众多女性作家中颇具特色的四位。进入 80 年代后,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人们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影响,包括文学也在一个更宽泛的基础上展开了内在纵深挖掘,相继出版了一大批女性作家的各类作品及集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庐隐、石评梅、萧红、张爱玲等几位女作家身上,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女性文学热,深为大众读者推爱。

庐隐、石评梅、萧红、张爱玲无论是她们的人生践履,还是她们的作品,两者都共同建构了一个各自独立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她们的散文作品,则更直接、更充分、更全面体现出各自自我的艺术探索追求,并与那个时代撞击、渗透、媾合。时至今日仍以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作品的独特面貌,令人徜徉其中;她们所提供的巨大的思考空间和众多启示,仍让人激动、惊诧、叹惋。在我们行将接触她们散文作品之前,我们试图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四大才女”其人其作进行一些碎片式的切入,以为读者阅读之资。

一、历史机遇

无论是庐隐、石评梅,还是萧红、张爱玲,只所以她们以自己作品在 20 至 40 年代能够从众多的女性作家及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极具代表性,当非属偶然。但究其各位的创作生涯,除张爱玲外,庐隐的全部创作生涯,即从 192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第一篇作品至她生命终止的那一年,只有十二三年;石评梅开笔于 20 年代初的近代报刊,至 1928 年她患病长逝,还不到六七年时间;萧红的创作始于 1932 年夏,到 1941 年初病重搁笔,前后亦仅七八个春秋。她们何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创作了包括各类文体在内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作品,且各自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思想上达到相当的高度,是与时代的造就和个人因素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与碰击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

我们说时代出现的历史性变革常常给人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崭新的机遇。这个变革对文化人来说,更直接地缘于“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推翻了清封建王朝,结束了长达 2000 余年统治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但并未真正动摇其封建主文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八年后,即 1919 年,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而终于爆发,将矛头直指非人的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对其全面冲击、清洗,对当时的国民,尤其知识分子、文化人,不啻为一声惊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带来的精神成果,其突出表现是对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解放人解放个性,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目标,于是妇女和妇女问题第一次被放置在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内进行考察,并进入那个时代启蒙家的思考视野,这就为当时的一批知识女性进入文化、进入文学打开了一扇大门。仿佛是一道曙光,突然间将这一方荒疏、封闭的区域照亮,而一代新女性就从此孕化脱壳,从黑暗的历史隧道里跳出,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性作家群。庐隐、石评梅即是这一群体中颇具代表的两位。她们同当时的众多男性作家同样独立,却更直接也更自觉地以女性代言人的角色登上了中国文坛,从此开始了她们艰苦奇迷,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生探索。于现在人看来,她们的创作之路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相当疑惑、惊诧,但她们却以常人难以置信的巨

大付出,写就了一出美丽却凄惨、悲哀却灿烂的生命史剧和文学神话。

二、“娜拉出走”

四大才女之中主要是庐隐、石评梅,她们文学创作可以说一开始就即具个人倾向,明显地具有个人精神自叙传特征。作为“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庐隐、石评梅是最早的一代启蒙者,也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20年代的北京是“五四”十年潮起潮落、新文化新思想最为集中活跃的中心,且基本上集中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燕京大学这两个地方。庐隐、石评梅就毕业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她们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接受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熏陶,并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觉悟了的现代知识女性。明显地她们这是一次崭新的跨越,不仅是思想而且直接支配和影响到她们的全部生活及行为。但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男权社会并没有根本打破和改观,思想的解放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落差具体在女性个人身上,使得这些知识女性不得不毅然地作出抉择。她们最迫切的愿望是“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庐隐散文:《今后妇女的出路》),要做一个真正第一性的人。也就是说她们的超前的精神价值要求同那个时代有着绝不协调的关系,她们面临着是被“铁房子”窒息,还是走出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完善人格和理想的选择。摆在觉悟女性个体身上,则来得更为残酷,在男权社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中,女人的一丁点举动都可以被指斥为越轨和罪孽,一丁点反抗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血的代价,也未必能真正有所改变,更不用说女子的出走,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对族类的背叛。恰恰是在这最沉重的门槛和关卡上,庐隐、石评梅、萧红包括张爱玲都先后作出了几乎同样的选择,毅然脱离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即完成了“娜拉”式的出走。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的主人公,因不甘作家庭的牺牲品和丈夫的玩偶,为追求一己之身的独立自由而离家出走。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娜拉》全剧;胡适、袁振英等撰文称“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之大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对此剧的推赞和褒扬无疑对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相当

的影响。但胡适所关心的是娜拉这个反叛的姿态;是这个姿态包含的象征性含义或普遍的社会意义。对女性作家来说,她们当时是不可能欣然自愿地充当这一角色或在情感上表示一种时髦的追求,她们的出走,是基于对压迫的反抗、迫于无奈而又不得不作出的痛苦选择。虽然她们的文学创作由此得到了更充分的展开,也深受这一实践影响而深埋烙印,但对这一举动,即出走本身——这个反叛的姿态却很少作出直接的切入和描述。无论庐隐还是石评梅,都对此避而不谈,她们回避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同时也回避现实生活白话题与实质,宁愿徜徉沉湎于梦幻与理性的、情感与思辩的矛盾痛苦的情绪和冷色调的思考之中,也不愿触及这关键的主体本身,没有对它进行正面、直接的揭示。赤裸着出走已是悲惨中的悲惨,沉重的负荷不忍剥离最宝贵也是最脆弱的灵魂!“出走”这一形式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对当时的女作家具具有不可忽视的含义,它潜在地对她们的创作心态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以至于影响到她们文本的主题、形式范畴,及她们艺术的触角与视点,庐隐、石评梅的散文(或称散文精神),更是直接体现了这一特点,在形态上明显地具有精神的自叙传特征,也即突出了对现实的思考和升华了的情绪、精神化倾向。

三、悲哀情结

四大才女中,除张爱玲外,庐隐、石评梅、萧红均非永年,都是在风华正茂、作品日臻成熟之时撒手人寰。庐隐原名黄英,祖籍福建闽侯,曾经两次爱情婚姻生活。第一次是在东北女师上学期间与北大哲学系学生郭梦良认识并相爱,当时庐隐解除了自己的婚约,不顾社会家庭的反对,毅然和尚有妻室的郭结合并生下一女。两年后郭因病逝去。1928年,庐隐在友人家里结识了比她小9岁的清华大学的李唯建,由友谊到爱情到结婚。庐隐是一个做事相当干脆爽朗旷达的人,她在女师高时即积极参加办刊物、结社、讲课、旅游、演话剧等活动,有着蔑视世俗、敢爱敢恨的性格。但庐隐的性格与创作心态,却是两重面貌,正如她在散文《庐隐自传》中所说:

“……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的遮满,深深沉

到悲伤的境地去。”庐隐自己道出了她创作的心态。在庐隐的内心世界里,由于那种无名的悲哀阴翳的潜质,她才不得不通过宣泄的方式去体验“悲哀”,并说“悲哀是一种美妙的快感”。这是特有的女性的悲哀,它不同于男性的客观的悲哀坚冷,而富于女性诗化的悲哀情绪,是一种多情、敏感与忧虑、感伤共同作用、淤积的连续性的弥散。这种悲哀,不仅源于气质的因素,也包括其思考的迷惘、性爱的苦闷在其中。茅盾说:“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这同样适用于庐隐散文作品,较小说而言,只是更直观、更真诚而已。庐隐的散文作品,有一大类明显地是自我感受的宣泄与陈述,尤其对她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石评梅更是充满了超越了亲情的姊妹般情感表达,在石评梅逝去之后,为其写传,字里行间蕴含哀思与无奈的惋惜;在与郭梦良相恋期间写下的“云欧书信”,更是脱离了肉体的外在感受而进入到一个情感、灵魂相互交触的理想状态,弥散着圣洁的宗教气氛,固然有泛情的倾向,但不失真诚与渴望,热情与大胆;其心态时而阴晦,时而光亮,时而伤悲,时而排斥,朦胧着一丝哀伤却美丽的薄雾,纯粹是情爱升华的表现。

庐隐是一位思辨才识相当健全的女性,“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庐隐论》,《作家论》第77.78页),庐隐的散文则更为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念。《今后妇女的出路》、《文学与革命》(在爱国学生周会的讲演稿)提出了妇女走上社会获得其作为人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虽不甚深入,已把摸到了社会历史这一主题,是难能可贵的。

正当庐隐在创作日渐成熟、出现新的转机之际,不幸于1934年5月13日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又因误医误治而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临终前,她将丈夫叫到身边说:“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庐隐》第261页)。35岁的庐隐撇下两个女儿和自己心爱的作品悄然而去。

庐隐的一生曾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形成她以“灰色眼睛看人生”,她的散文不粉饰、不掩盖,即是弥散着“悲哀”也绝对的真诚,虽然她的思辨没有达到她本当应有的高度,由敏感、忧虑缠绕着一个脆弱的哲学臆病和解不开的思维怪圈,但她始终执着于“五四”精神,她以其叛

逆的性格和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怀疑、叛逆精神使她的文本更接近于那个时代。

与庐隐同处一个时代同毕业于一所大学两人又是要好朋友的石评梅,其作品亦同样具有个人精神自叙传特征,也是她散文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提起石评梅,便自然使人联想到她和高君宇那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探索了石评梅的爱情苦旅与人生悲剧,也许更有助于了解她的创作及作品。石评梅“天生有一种神秘的思想,她愿意自己是一出悲剧中的主角,她愿意过一种超然的冷艳的生活……”,从石评梅后来所经历的生活直到离世,她的确实践了这点,在作品中也充分体现了这点。在石评梅人与文的关系上,天性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远超过了其余三位。恰恰是她天性中深植的深刻的神秘悲剧因素决定了她爱情生活的必然悲剧。石评梅学名石汝璧,乳名心珠,字评梅,生在山西平定县的一个山城里,家境中等,母亲是继弦。在中国的家庭里,这种关系或许就对她产生了一些影响,她在日记中写道:“……母亲在这个清静的夜幕下,常常弹弄着凄切的声调,常使我在一夜枕上,流许多的伤心泪。”可见幼时的石评梅已是个易动感情爱伤心流泪的女孩子,那份伤感的种子已植埋于心。18岁时石评梅为预备升考北平女子高等师范来到北京。孤女在外,评梅的父亲就托转友人来照顾她。于是便有一个W君经常去到女师高去候望她。于是石评梅便展开了一种新生活,爱情的帷幕就此揭开。那个W君,即吴天放。当时W君经常地去学校找评梅,而评梅不愿去找他。但几个月后的寒冷的一天,石评梅鼓起勇气去到W处会面。据庐隐《石评梅略传》说:“他(W)对于评梅只不过游戏似的,操纵她处女的心,自然评梅是初出笼的小鸟,很容易的,就把一颗心交给他……”可见石评梅是极真的女子,感情之投入当是可以想象。但当石评梅发现了吴是已有妻室的人时,“她的心是伤透了,怎么都难以恢复,从此评梅发觉她的理想,完全是在梦中,沉入愁城梦海中了……”(庐隐《石评梅略传》),在评梅作品中这段情况没有直接反映,只有《别后》、《漱玉》、《心之波》、《末次的泣祷》几篇有闪烁其词的极少文字,但这次的初恋对石评梅打击极端严重,直接影响了石评梅后来全部的人生行为和作品的创作心态,而且影响之深令人难以想象。

与庐隐一样又不一样的,是石评梅的作品中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

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且在情感层面上,石评梅是更加脆弱,更加哀苦,常常是通篇充满了诸如“冷月、孤坟、落花、哀鸣、孤魂、残叶”之类的词汇,翻开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流汇而成,满纸辛酸泪。在《漱玉》中:“……我只有新泪落在旧泪的帕上,新愁埋在旧愁的坟里。……我们何必向冷酷的人间招揽同情,只愿你泪流到我的心里,我的泪流到你的心里……”这种情感的外泄说是感染别人,更是感染她自己。这是石评梅异常压抑的心理情绪的直接表白,情感浓厚达到了意志力难以承受的重量和极限。这仅仅是不幸的开始。初恋的不幸,并没有使石评梅走向别处,寻找心灵之外的东西来转移、替代或麻痹自己那颗受伤害的心,反将此更封闭更严密地包裹起来。因此,当和W君分手不久,高君宇(天辛)狂热地追求石评梅时,石评梅则表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不幸有W君伤心之遭运,奈何天辛偏以一腔心血溅我裙前?”“不幸”与“奈何”道出了石评梅的心迹,事实上石评梅并没有接受高君宇的爱。高君宇为评梅素洁之心所感动认为自己没有爱的资格,便回家乡和他的妻子离了婚,并写长信告知评梅,评梅却在日记上写如下一段文字:

“接天辛(高君宇)信,详叙家后情形,详详略略,像一篇小说,真的!并且是确实,他已得到她的谅解,而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连礼教上应该爱好的人也没有了!我终究是对不住他!”

到此程度上石评梅还是没有接受高的爱,虽也感到了些许愧疚。说高打破桎梏,是试图为自己找一个不爱的借口和托辞,这对高君宇当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紧接着体质极弱的高君宇竟然肺管破裂,不久谢世。石评梅整理了高的遗物和遗书,便确认为高的死是自己所致。于是石评梅悔恨交加,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从此沉入万分痛楚之中,常常一个人深夜到高墓上泣哭,精神更加脆弱,人也更加憔悴了,并且抱定了素志,一直怀着对高的负疚感沉湎于悲苦之中,直到最后离世。这期间她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了解了什么是人生,也了解了深刻的悲哀,形成并确立了她悲哀的人生观。她的新女性的觉悟和志识,又使她切身体会到社会的残酷,这残酷和她不幸的遭际联合起来,却找不到丝毫的出路。与石评梅理智情感的不平衡和矛盾并行的是罪恶社会对理想和梦幻的摧残,从而使石评梅不仅心态上无法以

现世者的面貌游戏人生,而且她天性上也不允许,所以只有转向情感这一层面,沉入悲哀的情结之中。这使她的散文作品慧智由苦情笼罩,沉涵悲楚又被生存的虚无捉弄漂浮,如《涛语》、《心海中》,甚是直观。

石评梅这两次恋情,直接影响到石评梅的创作。她的创作与情爱生活天然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仿佛创作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创作,创作和人生的情爱体验率系在一起,石评梅是极独特的一次个案,这使她在“五四”女性作家中弹出了一个独特的悲哀情感旋律。对创作中的石评梅来讲,创作倒是一种解脱,并非时时都处于作品中传达的那样绝对的痛苦中,而是沉醉在悲哀的欢乐颂里,因此她的作品才得以升华,从一个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女性脆弱却执着的群体心态的一部分意义。石评梅心态的“累”虽根植于自己天性,却能进而扩大到当时觉悟的知识女性普遍的状况,才使她的作品虽在思想意义上走得并不远,但至今读来仍是感人心肺醇厚隽永。

然而石评梅的善感与抑郁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而是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为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石评梅给《妇女周刊》发刊词一文,即具力的爆发,显示了她理性的觉悟。而石评梅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意识,这是她悲哀人生观所致,也是现实的罪恶引发了她主观中这一层意识,两者是高度的吻合。她目睹了1925年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当时正任教于北师大附中的石评梅写出了《女师大惨剧经述》、《血尸》、《痛哭刘和珍》等思想激进情感炽热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是短时间内挥写而成,是她体验到情感的骨子里压抑到不能表达而宣泄的结果。这是她作品中富于参与意识与斗争精神的一面,是成就其风格的亢扬强劲的一面。

正如庐隐所说,石评梅注定了是她悲剧中主角。她经历了幻想到现实痛苦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破坏、反抗的全部悲剧起落的连续过程、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她的散文就是她心迹的真实记录。在她生前的最后三年,她的文笔陡然锋利,试图走出现实和自身、环境和天性被压抑的怪圈,想“从她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头”,“扩大为悲悯一切应生的同情了”。恰在一个新的空间即将出现,也就是行将找到她理想所在的时候,流行性脑炎侵袭了本已积弱不堪的石

评梅,1928年9月3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飒飒秋风中悄然故去。她的全部作品(包括散文),成为她悲剧人生的真实注脚,载录了她一生哀艳清幽的心声。

四、命运抗争

在四大才女中,萧红的一生命运最为悲苦,这个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从童年、少年直到中年夭亡,一直处于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不幸者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了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抗争的历程,一次次与命运搏斗。从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41年病重息笔(搁笔),前后仅七八年的时间写出了一百来万字的作品,且深度广度及艺术手法上都较“五四”第一代女作家有长足的拓展和创新,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切使她付出了比别人更惨更重的代价,血的代价,以致在她临终前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看”,“半生尽遭白眼冷遭……身先死,不甘,不甘”。

先让我们来看看萧红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那些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又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靠着怎样的艺术创造酝酿产生的。

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1911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萧红11岁时,生母病夭,父亲、继母对萧红都很苛刻,只有祖父给了她些许的温暖和庇护。16岁那年,在祖父的支持下考入哈尔滨市一所区立女子中学,却因参加哈尔滨爱国学生运动引起父亲的不满。1930年夏,父亲中断了萧红的学业,令她与包办婚姻的未婚夫王恩甲“完婚”。萧红不从,父亲、继母、舅父等一致地镇压她,萧红躲在婶母家中,后逃离了家庭,去到哈尔滨,时年19岁。又一个少女“娜拉”出走了,但娜拉的出走并不意味着命运会根本改变,也许更深的陷阱早已摆就。萧红出走后,有段时间回到学校,白天她趁同学上课时借她们的床铺睡觉,晚上便流浪街头。可以想见此时的情状对于一个孤弱无依的离家少女来说其实是被抛弃的角色。因为萧红走后,父亲即宣布开除了她的祖籍,并严令家人不许同她来往。寻找新的支撑点和依靠也许正合乎现实对萧红的要求。当时萧红的逃婚已给王家带来了极大羞辱,为平息事端,萧父摆酒宴赔礼才得以了结,但萧红却终

于在无家可归的困境下敲响了自己所逃避的对象王恩甲的大门。何以如此？这是一个怪圈，一个悖论。否定一个范畴，并不意味着对那个范畴的全部排斥，无家的痛苦促使萧红乞求从别处获得家的代偿，这是一个心理之谜。但有一点须说明的是原先萧红所反抗的逃避的，现在却接受了，其实是十分不得已的做法。一是她的同学好友徐薇迁家杭州，她曾经的恋人李君已有妻室并欺骗了她；再者由于萧红的幻想和幼稚，试图寻找一线的希望可能得到一个“家”，而她并没有直接同王恩甲发生正面冲突。据铁峰考证，“萧红走投无路，又不肯向家庭屈服，决定找王恩甲和好。萧红去顾乡屯王家，被王母与王妹逐出，王恩甲闻讯后找到萧红，表示愿意与她同居”。自幼孤独的萧红在脱离父亲的家庭后，更加孤独，现实逼迫她不得不为了逃避孤独而去寻求她想象的“家”的庇护。是不得已之举，这期间萧红游移在李王两者之间，体虚浮肿、怀着身孕被王恩甲抛弃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阴湿、狭窄的小阁楼里，险些被旅店老板卖到妓院，以抵偿王恩甲所欠的六百元旅食费。此时，萧红21岁，已经历了一般少女所不堪经历过的。

这段经历，在萧红后来散文作品中并没有直接的描述，但这段经历使萧红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强化了对“家”的感受，这反映在她的小说上比散文更加突出，但也在后来的散文创作中以另一种心态对此进行了反映，这就是无家却思念着家、恋家却痛苦地离家的“无家”的情结，是夏娃失乐园的心态。在哈尔滨期间，萧红写下了《祖父死了的时候》一篇中，先写了与祖父之间的骨肉之情和因祖父去世带来的痛苦，并发誓祖父死了以后“我必须要家”。而后来每当萧红痛苦之时总要想家，如《感情的碎片》。她在《失眠之夜中》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确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自称无家的人，实际也是为家所深深困扰、痛苦着，只不过是出于创伤而深埋，由于反抗而诀别，却又因心灵的升华时时沉重地负荷着的那个时代“家庭”的桎梏，笼罩着无法解脱的巨大阴影。萧红的出走事件，在她的心理上埋下了极深而隐蔽的一层，从而渗透影响到她后来的创作与生活之中。

直接影响到萧红命运改变并引发萧红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当萧红在东兴顺旅馆命如草芥走投无路之时，不得已写信给一家报馆求助，于是萧军来了，走进了她的生活。“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

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个美丽的灵魂！”萧军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把萧红从阁楼救出，不久萧红临盆，萧军把她送到了医院，生下一个女婴。两萧由此产生了感情，在商市街租了房子同居。此时，萧红不仅生活上爱情上有了庇护和温暖，而且在萧军的鼓励下开始了文学创作，这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几年后，萧红把她们这最初的共同生活片断记录下来，写下《商市街》、《桥》。这是一段艰苦得不能再艰苦的生活，作品中刻划了具体的生活细节，无不是围绕着生存的问题，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爱情的浪漫让位于生活的艰辛，如一个鞋带断成四截，两人来用，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欧罗巴旅馆》、《捉篮者》）；大雪天上街穿着夏天的通孔鞋……同庐隐和石评梅相较，由于生活的缘故，萧红的作品一开始就把视线投向现实生活，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直接反映到生存的问题，远远脱离了石评梅的梦幻式的“悲哀情结”，生活的悲苦没有使萧红染上悲观主义情绪，倒是直面看生活了。无疑这是一个进步，标志着从理想到现实的转移。

如果说1932年，萧军引导萧红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的话，那么对萧红创作生涯、创作精神产生更大影响的应当是鲁迅先生。1934年5月，两萧因形势所迫，逃到青岛，同年11月又转抵上海。11月30日，鲁迅接到他们的信约在内山书店见面，从此开始了与鲁迅一家的交往。1936年春，因萧军的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给这个家带来了危机，两萧的性格和体质之间存在着的差异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使萧红又一次面临失去家庭的危机。萧军天天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撇下萧红在家中忍受孤独哀伤，于是“每每整天耽搁在鲁迅家中”。鲁迅全家对萧红全然一见如故，彼此亲密得宛如一家人。鲁迅很喜欢萧红，视她如调皮的女儿，而萧红则“应当说像祖父一样……”看待鲁迅。在萧红最苦闷的日子，鲁迅先生安慰她，许广平日夜陪她长谈。这一切不仅给萧红以家的温暖，更深深地影响到萧红的创作。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篇中，萧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更突出的是鲁迅影响到萧红整个创作方向和创作态度。在30年代纷纭的文坛中萧红能够不追逐时尚，保持自己独特的创作态度，无论在题材上和艺术手法的探索上，坚定自己并不脱离时代，达到了相当的理性自觉和文体自觉。当时许多人包括萧军却认为“她（萧红）的散文有什

么好”，而鲁迅却认为萧红的文笔是“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并告诉萧红“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1936年，她还在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宣言上签名。这使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以女性的不幸联系到中国人受压迫的不幸，在整个作品中（包括散文），具有新女性自尊、自信、自立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她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没有绝望过。抗战后，她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当时的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人类的愚昧”，她把笔锋转向宣传抗日和揭露“人类的愚昧”，创作的重点转移在集中批判病态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传统意识对民众的精神毒害上。萧红这种创作思想显然是受到鲁迅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她开始把“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单纯地表现民族意识不觉醒，而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这种觉悟和意识在她的散文《流亡者》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漂泊生活的迁变，再现了丧失家园的沦陷人民的痛苦与灾难，其主调是民族的不妥协的爱国精神，进而影响到她的小说创作。

在萧红文学创作不断取得成果的同时，爱情和家庭生活却连遭不幸。1936年夏到1937年春，不到一年间，萧红连续三次只身出走，三次又悄然而归。1938年，终于在西安与萧军永远分开。这期间历史的风雨和家庭破裂迭织在一起，使萧红饱尝了情感和肉体的苦痛，因而存下不少与萧军的通信，及自己在孤苦流亡之境中写就的大量散文。当时萧红随MD（端木）南下武汉，勉强与MD辗转生活了三年多时间。1942年1月，长期奔波的萧红终因身心不支而病倒，又因医生误诊误医，割断了她的喉管。她带着满腔的痛苦和不甘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俭葬于浅水湾。

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她的创作集中于30年代，在当时的女作家中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自己的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享誉海内外。1993年9月5日在萧红的故乡呼兰河畔举行的“国际萧红艺术研讨会”，更使萧红及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形成了她同时代作家身后无法形成的研究热潮——“萧红热”，并且经久不衰，直至